

全球對話

Global Dialogue

3.1

社會，形構生成中

Margaret Archer

ISA和Izabela Barlinska

Riaz Hassan,
Mohammed Bamyeh,
Jacques Kabbanji

穆斯林世界

- > 俄羅斯當代的性別問題
- > 烏克蘭的公共社會學
- > 羅馬尼亞怒火燃燒的冬天
- > 超越全球化的羅馬尼亞社會學
- > CriticAtac：反資本主義宣言
- > Sociopedia.isa三週年
- > 更好的全民健保
- > 悼念Ivan Varga，1931-2012
- > 「開放使用」開放了那一扇門？
- > 介紹印度編輯團隊
- > 影像社會學：邊緣求生存

NEWSLETTER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第3卷 / 第1期 / 2012.11
www.isa-sociology.org/global-dialogue/

GD



> 主編的話

語言問題

第二界ISA論壇相當成功，3600人、55個委員會參加這場和University of Buenos Aires的Economics Faculty一起舉辦的盛會(8月1-4日)。這要感謝ISA副會長以及論壇會長的Margaret Abraham，Izabela Barlinska和她秘書處的同仁，在地籌辦會長Alberto Bialakowsky和副會長Alicia Palermo。其他還有各個委員會的共同合作，讓我們可以容納超乎預期的人數參與，以及在Buenos Aires進行了一場跨國的精彩討論，也對拉丁美洲的社會學留下深刻印象。此刻，我要說：我們準備好前進2014年的橫濱大會了！

ISA上一次在拉美是什麼時候？這得要回到1982年的墨西哥。如Izabela Barlinska在這期的訪談中所說的，那可是一場氣氛緊張的世界大會，在地的與會者對於美語帝國主義的批判砲火猛烈。幾年之後，西班牙文才成為ISA的官方語言。如今30年了，我們的確有所進步：我們有同步翻譯，有西班牙語的專屬場次，有多與場次，也有大家的協力幫忙克服語言問題。

還有，30年後的現在，ISA也變得更多元了。不只是語言如此，其他各個方面都是。不過英語也變得更加霸權。好處是將社會學的版圖拉得更廣了，讓更多人可以接觸社會學。可是英語的擴張也造成很多不平等，像是對於那些非英語使用者的排斥，以及英語學者內部的階層化。英語的流利，遠比其他語言流利來得更更有優勢，因為不論在報告和發表上都佔盡便宜。英語不僅在世界上是一種優越身份，在學術界也是如此。

當世界上所有的大學都在較勁排名時(以及隨之而來的物質利益)，在國際期刊發表變成是首要目標。這裡不僅僅是指用英語發表而已，而還包了要用英語系國家的研究框架和典範去套在各國的經驗上面。這常常是削足適履。巴勒斯坦的社會學家Sari Hanafi這麼說：「國際然發表、遺棄在地，或是在地發表、被國際淘汰。」想要超越這個困境，就得說兩種語言、具備兩種專業能力、加倍工作、對更多觀眾說話。這對美國和英國的社會學家也是如此。這個意義下，Buenos Aires論壇為全球社會學立下了一個新的標竿。

全球對話一年發行5期，以14種語言刊出。請到ISA網站上可閱讀全文。投稿請寄給：burawoy@berkeley.edu



Margaret Archer, ISA前會長。正在闡述她的morphogenesis概念：社會中的行動者和結構是一個交互影響的過程。



Izabela Barlinska繼續為我們回顧ISA過去25年的歷史。特別是在秘書處搬到Madrid之後的故事。



Ernest Gellner, Max Weber和Edward Said是辯論穆斯林現代性的重要人物，也分別反應了Riaz Hassan, Mohammed Bamyeh and Jacques Kabbani等人之間觀點的分歧。

> 編輯團隊

主編:

Michael Burawoy

執行主編:

Lola Busuttil, August Bagà

副主編:

Margaret Abraham, Tina Uys, Raquel Sosa, Jennifer Platt, Robert Van Krieken

編輯顧問:

Izabela Barlinska, Louis Chauvel, Dilek Cindoglu, Tom Dwyer, Jan Fritz, Sari Hanafi, Jaime Jiménez, Habibul Khondker, Simon Mapadimeng, Ishwar Modi, Nikita Pokrovsky, Emma Porio, 佐藤嘉倫, Vineeta Sinha, Benjamin Tejerina, 伊慶春, Elena Zdravomyslova

區域編輯

阿拉伯:

Sari Hanafi, Mounir Saidani.

巴西:

Gustavo Taniguti, Juliana Tonche, Pedro Mancini, Célia da Graça Arribas, Andreza Galli, Renata Barreto Preturlan, Rossana Marinho..

哥倫比亞:

María José Álvarez Rivadulla, Sebastián Villamizar Santamaría, Andrés Castro Araújo

印度:

Ishwar Modi, Rajiv Gupta, Rashmi Jain, Uday Singh.

伊朗:

Reyhaneh Javadi, Najmeh Taheri, Hamidreza Rafatnejad, Shahrads Shahvand, Saghar Bozorgi, Tara Asgari Laleh, Nastaran Mahmoodzade

日本:

西原和久, 芝真里, 姬野宏輔, 高見具広, 岩館豊, 池田和弘, 福田雄, 三部倫子, 佐藤崇子, 小川翔平, 井出知之, 堀田裕子, 小坂有資

波蘭:

Mikołaj Mierzejewski, Karolina Mikołajewska, Jakub Rozenbaum, Michał Chełmiński, Emilia Hudzińska, Julia Legat, Adam Muller, Wojciech Perchuć, Anna Piekutowska, Anna Rzeźnik, Konrad Siemaszko, Zofia Włodarczyk

羅馬尼亞:

Cosima Rughinis, Ileana Cinziana Surdu.

俄國:

Russia: Elena Zdravomyslova, Anna Kadnikova, Elena Nikiforova, Asja Voronkova

臺灣:

何經懋

土耳其:

Aytül Kasapoğlu, Nilay Çabuk Kaya, Günnur Ertong, Yonca Odabaş, Zeynep Baykal

媒體顧問:

Annie Lin, José Reguera

> 本期內容

主編的話：語言問題

2

社會學作為志業：社會，形構生成中

by Margaret Archer, 瑞士

4

ISA與 Izabela Barlinska

Interview with Izabela Barlinska, 西班牙

6

> 辯論

穆斯林世界的匱乏

by Riaz Hassan, 新加坡

9

回應Hassan：問題的過度化約

by Mohammed Bamyeh, 美國

12

回應Hassan：「東方主義」的侷限

by Jacques Kabbanji, 黎巴嫩

14

> 蘇維埃

俄羅斯的性別問題

by Anna Temkina, 俄羅斯

16

烏克蘭的公共社會學

by Lidia Kuzemska, 烏克蘭

19

> 羅馬尼亞

羅馬尼亞的憤怒寒冬

by Cătălin Augustin Stoica and Vintilă Mihăilescu, 羅馬尼亞

20

超越全球化的羅馬尼亞社會學

by Ioana Florea and Delia Badoi, 羅馬尼亞

22

CriticAtac: 反資本主義宣言

24

> ISA

Sociopedia.isa 三週年

by Bert Klandermans, 荷蘭

26

更好的健保

by Ellen Kuhlmann and Claus Wendt, Germany, and Ivy Bourgeault, 加拿大

27

悼念Ivan Varga, 1931-2012

28

> 特輯

「開放使用」開放了什麼？

by Jennifer Platt, 英國

29

介紹印度編輯團隊

by Ishwar Modi, 印度

30

影像社會學：在邊緣求生存

by Alexia and Edward Webster, 南非

31



> 社會學作為志業

社會，形構生成中

by Margaret Archer, École Polytechnique Fédérale de Lausanne, 瑞士, 前ISA 會長, 1986-1990



Margaret Archer是ISA有史以來唯一的一位女性會長(1986-1990)。她開創性地以「形構生成論」(Morphogenesis)去解釋社會變遷的過程，強調社會結構與行動者之間的互動。這種互動唯有在文化理解的前提下得以可能。Archer的理論主要從她對於英國和法國的教育體系研究中發展而來。她發現教育體系結構化了本身的行動，也反過來重塑了體系本身。此外，Archer也是著作等身的一位「實在論」社會理論家，在世界各地都有追隨者。多年來她在Warwick University任教，近來在École Polytechnique Fédérale de Lausanne建立了Center of Social Ontology。

Margaret Archer在2008年的批判實在論國際會議上發表演說。

社會學從建立至今一直都試圖解答下列四個問題：我們來自那裡？現在如何？何去何從？該做什麼？而這些問題都在實在論的範圍之內，因為他們都預設了一個社會實在，在其中，人們從過去中走來，行動具有因果性，進而影響未來。在Weber的社會學作為志業的理念中，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則就是去解釋為什麼社會是像現在我們所看到著這樣、而不是其他面貌。所以實在論並不會把Baudrillard所說的「剩下來要做的就是去玩那些片段」這種話當真。Khalidun可能會說這種言論是墮落文明的象徵吧。

更糟的是後現代所謂的趣味性還真的把片段又在分解成更小的碎片。社會生活的所有面向，不論是巨觀、中層、或是微視的，都包裝塞進SAC—結構(structure)、行動(agency)、文化(culture)。

讓我們先澄清一下這些概念 若不考慮結構，人們所面對的脈絡就會像是隨機的萬花筒。若忽略了文化，沒有人可以了解他們所面對的周遭環境。若缺少了行動，社會活動就是社會秩序的自然結果。社會學的志業就是去解釋這三者的互動。若摧毀、瓦解這些面向，那麼

>>

社會學家無疑就像是殯葬業者，放棄了社會學，並為這三個概念開立死亡證明。我們有了這個死亡證明，那我們將失去解釋社會的能力，也將再也無法回答社會為什麼是現在這個樣子之類的提問了。

當我們考慮結構的時候，去結構化帶來了流動(flow)這個概念。液態性的隱喻意味著社會終究無法被控制。這個想法在早先的「runaway」、「juggernaut」、「risk」等概念之中就可以嗅到。後來這種思潮匯聚成一股新潮流，並由複雜理論引領前進。只是這個理論的不適切性可以在最近一次的經濟危機中看見。這次的經濟危機讓我們看到了以往被遮蔽的結構，我們從中更了解全球金融資本運作的方式，以及資本和國家之間的交互作用。這些種種仍然存在著，不曾消失，但是衍生金融商品、次級房貸、國家交換、債務交易等比起福特主義更需要被理解。

就是因為那些結構位置、關係、利益太過於交錯複雜，媒體才會把這整件事情簡化成銀行家的貪婪結果。Occupy Movement就是我們失去社會學解釋能力最好的例子。有誰知道他們是反對擲節、還是全球資本主義？當倫敦還搖擺不定時，Geneva movement的集會仍然保持著一定程度的不確定。我會看到非主流經濟學家比起社會學家在整起事件中還要來得有助益。像是Stefano Zamagni就分析了過去十位諾貝爾經濟學得主所帶來的災害，那社會學類似的分析在哪裡？社會學怎麼樣幫助我們去想像一個可欲的公民經濟？

這個事實讓我們把目光轉向文化。TINA (“there is no alternative”) 一直以來倡議「business as usual」。文化轉向的理論家喜歡把重點放在論述上面，可是經濟危機不能被簡化成論述啊。反正論述這個概念的強勢性已經取代了意識形態，將之視為是階級鬥爭的淘汰概念，應該丟棄。於是概念和利益之間的連結就消失了。消失的還有批判的思想泉源。我們不僅在表達意見的時候乾枯乏味，社會運動也是如此（這助長了TINA）。諷刺的是，當潮流匯聚成大洪水時，總是有一股反作用力在抗衡著。儘管跟不上快速的變化，不過就像美國的實用主義一樣，反動的環境卻也總是可以孕生出反身性的創見。

最後，我認為最重要的問題就是主體的死亡。主體在Foucault於40年前提出時就死了，如同把臉埋在海邊的沙子下面。人總是被刻意擦掉，變成墓碑，等著把名字填上去而已(Gergen)；也像不斷自我創生的自我(Beck)，或是最終變成只是一個虛幻的符號罷了。主體一旦死亡，意向性，反身性，情感，承諾等也都隨之消失，最後我們連想像未來的能力都會喪失。

我認為我們已經越來越難去維護人的課責性和潛力了，所以Andrew Sayer才會寫Why Things Matter to People這本書。社會學是人文學科，不過卻無法接合人文主義。因此，孤獨、邊緣化、或是社會排除這種題材很難受到重視。不過在先進國家我們可以看到這種現象越來越頻仍。社會學也很喜歡自我質疑，不敢去追求社會學的繁榮，把自己的需要當成純粹的生物需求。我不懂為什麼我們社會學不研究快樂、滿足，而把這些題材讓經濟學的數學公式去主導。解藥很簡單，那就是我們需要的一個可以茁壯公民社會的社會學。

現在當紅的社會學比喻是「液態現代性」。只是這種修辭既空洞又容易誤導讀者（還記得那些機械、生物、類神經的比喻嗎？）。社會變遷的理論往往只強調SAC的某一個面相而已，像是「資訊社會」之於「文化」，「全球資本主義」或是「帝國」之於「結構」，之於「制度個人主義」或是「反身現代性」之於「行動」。每個概念都抓住某個經驗現象，但都錯誤地以偏概全。反之，我們需要的是檢視SAC如何交互作用，社會結構型態如何生成浮現，如何改變，而不是只有修辭和比喻而已。

> 訪談Izabela Barlinska

續集

在上一期的全球對話(2.5)中，我們看到了一位年輕的波蘭學生和ISA之間的故事，以及她如何變成了一位ISA不可或缺的靈魂人物。在這個訪談續集裡，Barlinska博士也會告訴我們關於他如何幫ISA成為一個世

Izabela Barlinska和ISA研究副會長Margaret Abraham討論Buenos Aires論壇的事項。2012年8月。



界級重要組織的歷史。

布：妳Ryszard Kapuściński碰面的故事相當有趣，不過另外我很好奇的是，在1986年末，也是後來的會長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給了你執行秘書的工作機會，只要妳願意到Madrid去。所以一切就這麼定了？

伊：對，我到Madrid的時候是1987年的1月，單獨前往，一句西班牙文都不會。而我卻得建立一個辦公室！我猜只有年輕沒什麼經驗的小子才敢作這種事情吧！總之我沒什麼時間去想其中的意義。我到的時候隨身帶了一個大的箱子，裝了很多ISA的文件，然後就在西班牙學術研究院(Spanish Academy of Sciences)落腳了。ISA是受到了西班牙教育部的邀請，不過辦公室是設在研究院裡面。

布：妳完全一個人？

伊：唯一幫忙的人是我同事Sergio Contreras，是智利來的同事，也在Montreal和Amsterdam的秘書處待過。他幫忙的原因是他會講西班牙文。我們就這樣試著打造一個辦公的地方，這可難了。我的西班牙文可就是從建築的名詞開始學起的。很慶幸的是我後來很快的認識了教育部的人，因為所有的文件都必須經過這。所以只要辦事人員無法和我用西班牙文溝通的話，我都會直接被安排和長官見面，因此也很快和這些社會主義政府的官員有了良好的關係。和Felipe González這個世代的人打交道因此是我很熟悉的經驗。

布：他們一定對妳很好奇吧，從波蘭來的…

伊：波蘭那時候很有名哪！每個人都知道團結工聯，就像他們這些政治人物在西班牙的事蹟一樣重要。所以波蘭，至少是波蘭的反對派，在西班牙有很不錯的名聲。

布：所以大致上妳都是自己搞定。後來Cardoso卸任，Margaret Archer上台了？

伊：Margaret Archer是1986年選上會長的，還記得是在New Delhi的世界大會上。她是第一任、也是唯一一任的女性會長。我們不但一起工作，還成為了好朋友。

布：那妳到了西班牙遇到最困難的事情是什麼？

伊：大概就是適應新的環境吧。一旦我到達之後，我就要開始籌辦1990年在Madrid的世界大會。這意味著拉美的重要性，以及西班牙文終於變成ISA的第三官方語言。

布：是在那時候才開始？我以為1982的墨西哥大會就是了…

伊：墨西哥那次受到很多抗議，我指的是很多人抗議會議不是用西班牙文進行。而西班牙文的確定是很後來的事情了。所以這很像是一個新的大陸加入了ISA一樣，我們一開始根本沒有什麼先進的科技。電腦是有一部，不過那很不一樣。而且最困難的是那時全部的人都對我們的組織和大會表示善意，可是，這該怎麼說，有些人其實是想用這個組織達到個人的目的。所以事情就會變得不太愉快，沒有辦法滿足每一個人。我想ISA在這之中很難為、也很痛苦。總之Madrid大會期間其實氣氛很緊張，特別還是在University Complutense裡的三棟不同建築物理面舉辦，而且又沒有冷氣。你可以想那炎熱的程度…

布：所以後來印度社會學家T. K. Oommen當選了會長？

伊：沒錯！這個結果帶來很大的爭議，因為所有的西班牙學者都希望會長是西班牙人，結果ISA被內政部取消了集會組織的資格，也被西班牙研究院掃地出門了，於是辦公室就搬到了現在這裡。

布：所以ISA又得再一次搬家了…後來事情怎麼落幕的呢？

伊：後來還好是University Complutense的社會系與政治系願意提供我們辦公室。Miguel Ángel Ruiz de Azúa是政治與社會聯盟的會長，他是個大好人，而且對ISA來說也是個好事，因為辦公室設在大學裡面比較好。大學裡面有更多志同道合的人，包括老師、學生、以及文化氛圍。

布：那麼物質資源的問題是怎麼解決的呢？

伊：這的確是問題。首先ISA到西班牙的一個條件式西班牙政府會提供資金，就像之前在Montreal和Amsterdam一樣。然後這個合作關係持續了6年，西班牙政府也非常慷慨。不過後來這個資金來源就停了，ISA內部也開始擔心接下來改怎麼辦。而且我們也沒有其他的資助來源。不過當時網路興起了，還有電子郵件，所以大家開始覺得位於哪裡不是那麼重要，所以與其搬家，不如就留在西班牙吧。所以就這樣決定留下來了。不過我想強調一點，就是自從那時候開始，ISA的資金就完全是獨立了。

布：這可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一段故事！

伊：是，原因是我們的辦公室業務做得非常好，而且人事簡單。當然在那些時候活動不多、會員也不多的年代是還好。可是這也帶來了一個重大的改變：ISA不再每4年換一次秘書處地點了！

布：所以這也代表妳們可以建立自己的工作團隊了？

伊：是的，的確如此。Nacho (José Ignacio Reguera)就是從1990年大會後就一直工作到現在了。我遇到他也是因為波蘭的關係。當在研究院的時候，我或許在波蘭圈內有點名聲，於是有一天有一個小紙條上面留言給我說他是一個波蘭來的物理系訪問教授，想和我見面。我想說當然好哇。於是後來那個人是University of Torun的Jacek Karwowski教授。我們馬上變成了朋友。後來和他與他的朋友和家人也熟識，會一同聚會，我便開始更熟悉西班牙，因為別忘了我可是原本預期只會待4年的。後來也因此認識了同樣在物理系工作的Nacho。

布：所以他把ISA整個帶往電腦、email、網路的世界？

伊：Nacho建立了整個ISA的資料庫。這方面他可是個萬事通，而且能力強、負責、又有創意。好在有他，ISA得以在現今科技和社會媒體的時代裡面立足。我一開始跟他說我們需要什麼，他馬上弄好，所以合作得很愉快！

布：或許現在是個可以說說妳每日工作內容的好時機？

伊：每天我們就是辦公室例行事務，細節繁瑣得很。不過大家都說魔鬼就在細節中。所以這些事情或許無聊，可是都很重要，而且不能忘記...

布：忘記什麼？

伊：這個組織，以及為什麼人們要和我們聯絡，以及即使是小小的一個更改地址的動作。別小看改地址，小小的地址改變會牽動到很多事情，因為很可能明天有一個人因為在網路上看到有趣的文章摘要就想聯繫這個人。

布：所以你的工作就是把所有的人連結起來。

伊：的確是這樣。這是一個很大的社會網路，許多人都因為這樣而有了連結。現在這個網路有5000多人，另外有3000人在資料庫裡面。而且我們還有60個研究委員會等等附屬單位，也有60個國家會員。這些都具有很大的潛力，有要更小心地維繫才行。

布：可以再多說一點嗎？

伊：ISA的執行委員會決定了ISA的目標和政策，然後秘書處就要去貫徹這些方針。一個很重要的是多數的會員的母語都不是英語，所以在資訊傳達方面要非常小心，建制網站時也一樣。若是網站的科技程度越高，很有可能有些國家的會員會很難使用網站介面，因為電力供應比較不足。這種國家之間的差異和不平等，是必須時時刻刻都記住的。這對於我們這個小小的辦公室來說的確很特別，而且這種小細節可以幫助到世界那麼多的人，對我們來說意義重大。

布：嗯！所以秘書出總共有多少人呢？

伊：總共有4個。部份兼職、部份全職。不過雖然我們每個人各司其職(會員、資料、網站、公告等等)，但很幸運的事我們是一個合作得很好的工作團隊，一起建立這個世界的社會學網絡。

布：真的！而且你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我想歷屆的會長也是很重要。當Oommen擔任1990-1994年的會長時，妳們正在處理辦公室被迫遷走的難題，然後接下來Immanuel Wallerstein擔任會長，舉辦了Bielefeld世界大會？

伊：Immanuel任職期間，ISA的改變很大。他把網路和email的文化帶進了ISA。當然一方面也是那時候網際網路正在興起，不過Immanuel很積極的推動這件事情，想把這個科技用在好的方面。和他共事很有趣。之前和Margaret Archer相處也很愉快，因為那時候當地環境的關係，處境很艱難，可是我們還是辦了期刊International sociology和Worldwide Competition for Junior Sociologists。那是一段像是在革命的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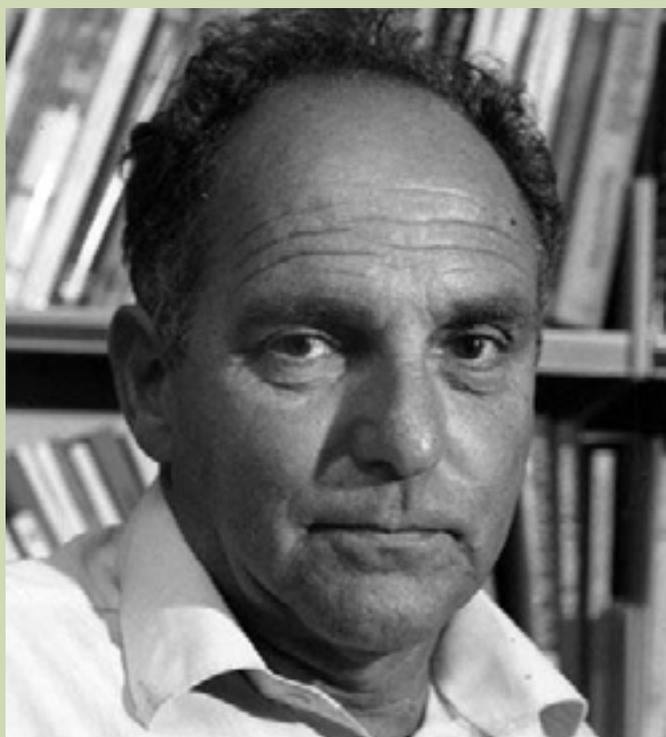
布：是啊，我想這正是重點所在！佈新，但舊的也要延續下去。

伊：對，若是好的事情，我們就會一直延續下去。

布：Izabela，謝謝妳願意接受訪問。我知道妳並沒有很希望走到台前，因為妳總是默默的在後台努力工作。不過我想ISA的會員還是很高興看到妳接受訪問，聽妳說關於ISA的歷史、25年前的ISA是長什麼樣子。我相信，不管問任何一位ISA的會長，他/她們一定會說妳是ISA運作的靈魂人物。在此我想代表所有的ISA會員，獻上我最誠摯的感謝。謝謝妳所做的一切！■

> 為什麼穆斯林世界 缺乏自由、低度發展、 匱乏知識？

by Riaz Hassan, Institute of South Asian Stud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Ernest Gellner (1925-1995): 「伊斯蘭是世界三大一神教中最接近現代性的。」

Ernest Gellner在他相當具有啟發性的Muslim Society一書中很大膽的宣稱：「不論從普世主義、聖經、聖經平等主義、完全參與神聖社群、社會生活的理性話和系統化等標準來看，伊斯蘭是西方三大一神論中最接近現代性的宗教」(Gellner, 1983: 7)。他說，因為這樣，所以阿拉伯世界在Poitiers一役中贏了，然後把伊斯蘭教推廣到歐洲。我們應該推崇Ibn Khaldun的「Kharejite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借用Weber的話來說)，因為我們看到了現代理性主義如何在新Kharejite清教徒的實踐下(特別是北歐)得以可能；另一方面，Gellner說，若看到歐洲仍然具有「巴洛克、操弄式的、侍從

主義、萬靈論等無秩序的世界觀」、因此也仍然是基督宗教的話，現代性是如何不可能。

不過我們現在可以看到正好相反。我們若從聯合國或世界銀行發展報告來看的話，很難不發現其實伊斯蘭世界是和發展、自由、民主等理念背道而馳的。原因大家還在辯論中。不過社會科學家指出罪魁禍首包括了伊斯蘭教、文化、石油、特殊的阿拉伯文化和制度、以巴衝突、「制度和土地的沙漠」、虛弱的公民社會，以及女性的從屬地位。

> 發展落後

或許爭辯的最激烈的議題就是穆斯林世界的經濟發展落後和缺乏民主是否可以歸因給伊斯蘭教了。研究指出在17世界的權力中心轉向歐洲之前，伊斯蘭世界的經濟變動是和歐洲一樣的。穆斯林的貿易相當成功，而且可以把貨物和信仰傳播到世界其他角落。經濟史學者Angus Maddison說，在西元1000年的世界貿易佔有率，中東(10%)是勝過歐洲的(9%)。而到了1700年，中東降到了只剩下2%，但是歐洲成長到了22%。西方學者普遍對於這個現象的解釋是穆斯林的反商主義和禁止借貸。可是這種解釋並不適當，因為可蘭經其實比聖經更為重視商業貿易，借貸也是一樣。另外，先知穆罕穆德及其妻Khadija都是成功的商人。許多穆斯林則是歸因給西方的帝國主義。可是，為什麼曾經那麼強大的國家會向西方低頭呢？

土耳其裔的美國經濟學家Timur Kuran (2011)完全反對上述的說法。他提出了很足夠的證據指出中東的經濟落後並非殖民主

>>

義、地理環境、或是伊斯蘭和資本主義的天生不協調。問題是出在貿易法律的實踐。中東的法讓伊斯蘭在10世紀之前取得了很大的貿易成功，可是之後因為基本的精神是和現代的經濟生活背道而馳的，包括了：私人資本的積累，企業、大規模生產、以及非個人的交易模式。

伊斯蘭的夥伴關係是穆斯林商業組織的主要精神。這個關係在雙方其中之一的意願、或是死亡的情況下可以任意終止。如此一來許多商業規模很小，或是很短。許多在穆斯林很成功、規模很大的貿易公司都是非伊斯蘭經營的。所以，根深蒂固的這個傳統其實對商業發展有害。例如只有一人死亡，那麼他的部份就會被其家庭成員給均分掉，不利資本積累，並且壽命很短。我們可以從可蘭經上找到解釋。因此這會組織穆斯林商業去累積資本，無法和西方的競爭者匹敵。

> 缺乏民主

哈佛的經濟學者Eric Chaney (2011)批評那些把民主匱乏的現象歸咎給伊斯蘭的文化、石油、以巴衝突、和生態沙漠。Chaney指出中東的民主問題和遍布的極權統治的確存在，但這是長期下來阿拉伯世界征戰後的權力結構所導致。在9世紀之後他們就以奴隸組織軍隊，而非徵召自己的人民。這種奴兵制度讓統治者可以相對獨立於地方武力和民兵，主權的行使較不受到限制。這種專制體系下，宗教領袖變成是唯一監督掌權者的人，所以這種宗教權力和軍事權力分開的模式並不利於民主制度的產生。如此一來，宗教和軍隊共同合作，壟斷權力，成為經典的制度平衡模式。這種統治方式也常以可蘭經為正當性來源，用來保護他們自己的利益。

宗教領袖設計出一種平衡度，看起來是去保護人民，不過卻讓專制體制維繫了好幾個世紀。統治者依賴奴兵，但完全和民眾脫勾。宗教領袖則和軍隊合作共同防止其他會讓這個利益共生體崩壞的選項發生。如此的集權和孱弱的公民社會是長期以來的歷史制度遺產，從1100年至今仍然依舊。

不過，其他被中東穆斯林征服的地區並無法適用這個解釋框架。向是在印度、巴爾幹島、印尼、馬來西亞、撒哈拉以南

非洲。這些地方的制度仍然是由地方精英所決定，保有地方的文化和政治慣習。總之，民主在包括中東和上述的這些地區仍然少見，但在其他不是中東穆斯林所征服的伊斯蘭國家，民主的進程卻是顯然易見的。

> 知識匱乏

在2012年的Times Higher Education中的世界大學排名，從49個穆斯林國家(佔了世界12億人口，17%)中選出的大學，沒有任何一所在200名內。這是老問題了，而且是一個重要的知識落後的問題。美國只佔了5%的世界人口比例，但是有75所大學排名200名內。

許多因素可以解釋這個現象，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就是伊斯蘭世界的研究與學術資源短缺。穆斯林國家組織(OIC)的科學研究預算幾乎是全世界最低的。最近的一項UNESCO和世界銀行的數據顯示，1996年和2003年，穆斯林國家的平均研究支出是總體GDP的0.34%，遠低於世界的2.36%平均值。許多OIC國家中，特別是那些很富有國家，花了大把銀子在武力上，遠超過健康與學術的支出。世界上花最多比例預算在武力上前6大國都適中東國家：科威特、約旦、沙烏地阿拉伯、葉門、敘利亞、阿曼。他們花了超過7%的GDP在軍事上。不過教育方面就差異比較大。2002年中，馬來西亞、沙烏地阿拉伯、葉門、摩洛哥、突尼西亞、伊朗都是前25名的教育預算使用國家(Butler, 2006)。

根據世界銀行的教育指標來看，在2002年表現最差的國家，其中有15個國家是OIC國家，包括了非洲、孟加拉、巴基斯坦等。學術與科技投資最低的國家同時也是發表最少研究期刊的國家。2003年，世界期刊的發表平均量是每百萬人口137篇。OIC國家只有13。沒有任何一個OIC國家到達平均。此外，除了土耳其和伊朗，其他有24個國家的發表數量不是持平就是減少。土耳其從1988年的500篇到2003年的6000篇。伊朗則是從之前的100篇到現在幾乎已經2000篇了(Butler, 2006)。

其種幾個很明顯的解釋是對於教育和研發的經費嚴重不足。可是，文化和政治也是重要的解釋因素。亞洲的國家，像是韓國、新加坡、台灣、中國、印度等在科

>>

學領域都突飛猛進，在新興經濟體內排名很前面。公民社會的多元文化可以產生多元的制度，和集權的國家制度相抗衡。這點是伊斯蘭社會所缺乏的。

在許多伊斯蘭國家中有越來越多的阻礙。例如基本教義派就一直施加壓力，阻止那些和伊斯蘭世界觀不同的認識論出現，也敵視批判性的理性文化。這對大學和教育制度的健全發展是完全不相容的。強健的公民社會是國家發展的基礎，極權統治絕對不會帶來更好得發展。此外，質疑和妥協的文化也有助於發展科學。科技要進步，理性和自然的規則是前提。

在知識經濟時代，或是第三次的工業革命時代，財富的創造有賴於腦力勞動。我們看到OIC的國家很難生產出專利來，也很難出口工業產品。科技和知識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前提。所以發卓越的學術是很急迫的。唯有這點才可以讓穆斯林走向光明的未來。不過這恐怕也是他們最大的一項挑戰。

至於阿拉伯之春的啟示為何？這是歷史的命運嗎？我們或許可以樂觀的認為阿拉伯世界是可以擺脫獨裁政體的。這個地區正在歷經結構性的轉變，包括了教育的普及、都市化、工業化，和過去60年相比都有明顯的成長，也較為令人接受，並且有利於民主。阿拉伯革命的出現把2011年的阿拉伯世界帶上了歷史的高峰，前所未有。另一方面，像是土耳其、阿爾巴尼亞、孟加拉、馬來西亞、印尼則更有可能去扭轉歷史，不過他們首要還是得解決貧窮和公民社會體質薄弱的問題，如此民主才得以可能實現。■

參考文獻

Butler, D. (2006) "The Data Gap: Statistics on scientific investment and performance are lacking across the Muslim world." *Nature*, vol. 444: 26-27.

Chaney, Eric. (2011) *Democratic Change in the Arab World, Past and Present*. Harvard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and Brookings Institute.

Gellner, E. (1983) *Muslim Socie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uran, T. (2011) *The Long Divergence: How Islamic Law Held Back the Middle Eas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Kuran, T. (2011) *The Long Divergence: How Islamic Law Held Back the Middle Eas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回應Hassen

論問題的過度化約

by Mohammed A. Bamye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美國,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Review of Books主編



Max Weber (1864-1920)。「從Weber之後，為什麼其他社會不像歐洲的這個問題越辯越模糊」。

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自由、發展、知識這幾個概念是很不相同的，而且也很複雜。去評價這幾個概念決定於你怎麼去定義它們。無論是誰都很難在一篇短短的文章中精確地討論這三者的任何一個，何況這現象可是橫跨了10個世紀，涵蓋了整個穆斯林世界。所以Riaz Hassen的文章不只沒有新意、也把事實搞錯了的這件事，也或許就不意外了。可是話說回來，這個現象在當代的知識情境下很少見，畢竟社會學和人類學已經累積了一定程度對於穆斯林社會的瞭解。

Hassen就是反例。他不但沒有引用最新的文獻，還重複了舊的論點，從最早的Max Weber開始，像是為什麼非歐洲地區沒有出現歐洲的經濟模式這種問題，到現在在概念的

層次上可說是一團亂。他的這個問題不是在問不同的社會如何發展出不同的秩序與功能。這個提問才有切中核心。可是Hassen的問題比較像是從「問題」切入，去探討非歐洲國家到底出現什麼問題。若這是個有效的問題，答案就會像Hassen所呈現出來的一樣，很眾說紛紜，所以必須小心翼翼的梳理。例如，研究穆斯林的史學家知道伊斯蘭經濟法律有很多種，而且也不完整了，所以很難可以用可蘭經來解釋整體的伊斯蘭經濟歷史。如果只看看可蘭經，其實也很難知道實際上可蘭經是怎麼被實踐的。因為每個地區、每段歷史都可能造成很不一樣的結果(更多的解釋，看Gran, Abu-Lughod, Owen等人)。

穆斯林世界古老又龐大，更不是鐵板一塊。那

>>

些把這個地區視為是一個地方的學者，會發現一旦有更多的資料，變化就越多。舉例而言，Moataz Fattah (2008)想要解釋穆斯林對於民主的態度，其預設就是跟我想的一樣，把伊斯蘭視為好幾個不同的區域所組成。Hassen所引用的文章相當分歧，很難隨便就結合在一起。另外還有Hassen指出知識匱乏的兩個例外：土耳其和伊朗，不過卻沒有說明為什麼例外。所以看起來Hassen的論證是過於簡化的。

當我們有足夠的正去顯示殖民主義是一個重要的經濟轉捩點時，Hassen只是引用了拒絕殖民主義論證的文章，也沒有任何進一步的討論。還有其他證據指出中東世界的民主實踐大相逕庭時，Hassen也只是引用了另一篇具有高度爭議性的Eric Chaney的文章而已，然後把中東民主的問題全部輕易地推給文化。

更令人驚訝的是Chaney的這篇文章(簡化的歷史脈絡和因此可能造成的相反解釋)居然被說成具有充分的證據！而且也沒有提到自從2001年以來對於穆斯林所做的民主態度民意調查都顯示穆斯林其實是嚮往民主的這件事。例如，Gallup的調查了世界上80%的穆斯林，顯示其對於政治自由、權力、法治、言論自由的高度支持度，而且和美國人差異無幾。Hassen對這些一無所視，只是引用了一

篇理論和有經驗分析都大有問題的文章。

總體來說，想要從歷史因素來解釋當代社會現象的學者都比需小心的去說這件事情。例如，當你要說一個生長在13世紀的人缺乏當代的民主自由的素養時，首先必須確定你是否真的瞭解那個時代的背景和人。要解釋過去的人，你只能用對過去的人有意義的概念去解釋。到當代以前(然而這也是我們的時代區分)，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世界的社會秩序問題，其實是一個社會責任的問題。那個時代，國家遠比現在來的權力分散(see for instance Lapidus, 2002)。因此某些群體，像是宗教學者，扮演了古老公民文化的重要角色時，你很難去說這是跟當代意義下的民主有關。你只可以藉此討論伊斯蘭世界文化的可塑性和公民文化如何在不同的環境與社會組織生活產生互動。

若歷史是分析裡重要的一環，那我們就必須要有豐富的歷史社會學論證，而不是簡單的公式。前者可以顯示穆斯林如何餵社會生活賦予意義，以及他們怎麼和宗教和諧共生(Olivier Roy的話)。這種和諧共生就隱含了自由與包容其實是穆斯林世界的傳統之一。穆斯林本來就不需要跟歐洲學習多元文化。可是這種自由開放的文化在歐洲殖民者到中東之後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後殖民的極權體制。

這種威權政治從來就是當代西方的產物，不是什麼古代中東的傳統。

瞭解世界史的複雜性可以帶來更有意義的歷史社會學，也可以告訴我們現在人們的想法。但是只是輕易鄙視過去，輕易說誰沒有民主，輕易說誰還沒準備好，或是輕易地說誰還不像歐洲那麼進步，那世界上沒有什麼比這些還要更簡單的事情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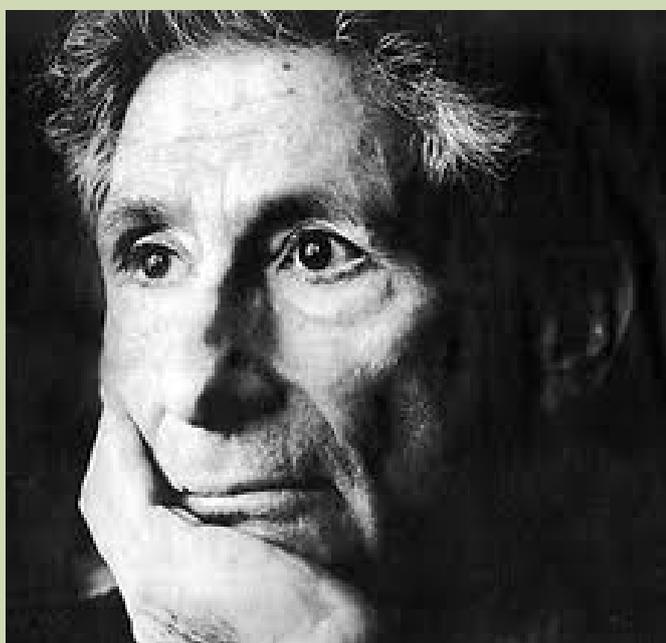
參考文獻

- Abu-Lughod, J. (1989) *Before European Hegemon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Esposito, J. and Mogahed, D. (2008) *Who Speaks for Islam? What a Billion Muslims Really Think*. New York: Gallup Press.
- Fattah, M. (2008) *Democratic Values in the Muslim World*. Boulder: Lynne Rienner.
- Gran, P. (1979) *Islamic Roots of Capitalism: Egypt, 1760-1840*,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 Lapidus, I. (2002) *A History of Islamic Societ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Owen, R. (1981) *The Middle East in World Economy: 1800-1914*. London: Methuen.

> 回應Hassen

「東方主義」的侷限

by Jacques E. Kabbanji, Lebanese University, Beirut, 黎巴嫩



Edward Said (1935-2003)。「像Said說的，西方是現代的，而非西方(特別是中東)仍很掙扎地在追求著。」

從2010年底開始，阿拉伯國家的民主抗爭之火開始蔓延開來。雖然結果如何很難預料，不過很清楚的一點的是，這運動表達了中東人民是拒絕極權統治的。他們也展現了一個很清晰的政治行動者圖像：「人民」。即使自發主義是這些起義的特色，但也和以往的「大眾」有所不同。這裡我們看到的「人民」是一個從屬者變成了自主的公民。這個圖像從來就不被研究阿拉伯社會的學者所接受，因此也帶來了許多學術上的挑戰。

從1960年代開始，阿拉伯研究的傳統就被貼上「東方主義」的標籤。雖然這個名詞藉由Edward Said的東方主義一書(1978)打響了名號，最一開始的原意其實要追溯回1963年當Anwar Abdel-Malek發表了一份前瞻性的文章：「危機中的東方主義」。東方主義指的是以西方的觀點去研究東方的知識論傳統。這也是個特殊和自我生產的一段歷史。就像Said所說得，東方主義標示著西方和東方在文化上的差異，是一個本質主義的描述。西方代表著現代進步，東方代表著落後(特別是伊斯蘭)。

Ernest Gellner和Bernard Lewis是兩個著名的研究伊斯蘭社會的學者，是東方主義學者的代表典型。在他們對於伊斯蘭文化的觀點(以及意識形態)和對歷史的詮釋中，我們會發現他們認為這是理解伊斯蘭的特殊方式，因此也讓伊斯蘭變得更特殊也更模糊。舉例而言，Lewis說：「很多方法都試過了，包括教育、工業、國會等等，雖然有些效用，可是都沒帶來根本的轉變，沒辦法讓找到一個在伊斯蘭和西方價值之間的平衡點。」而在Gellner眼裡，穆斯林社會則是弱國家和強社會的典型。

因此，穆斯林社會被一種特殊的認識論所再現：宗教是理解這個社會的關鍵所在。其他的社會都不能用這個方式，那是因為其他社會都不是用宗教來定義的。就像我們很難去說一個社會是「

基督教社會」、「佛教社會」一樣(除了一些特殊的民族誌以外)。而這樣對穆斯林社會的簡化是應該要有證據來支持的。再者，啟發了後代無數學者去研究宗教和經濟的Weber就說過，並沒有那一個特殊的宗教可以決定經濟形式。所以我們不禁要問：為什麼這種簡化老是可以套用在穆斯林社會上呢？

上述講了關於本質主義和東方主義的種種不適切性後，我們還必須要問是什麼因素防止了穆斯林社會的現代化。這個提問把發展視為是線性的過程：若資本主義可以在西方(以及其他地方)成功，那麼為什麼穆斯林社會就不行？

有學者用國際組織的論點來回答這個問題。因此對於Hassen的經濟落後和民主匱乏的觀點來看，這是穆斯林社會特有的問題。經濟落後不是由殖民、地緣所導致，而是內在的伊斯蘭法所影響。可是，我們不禁質疑到：為什麼那些很晚才實行這些實定法的國家，例如19世紀的奧圖曼帝國(土耳其)和20世紀的伊朗，卻還是無法克服經濟落後的問題？

至於民主匱乏這點，Hassen說這是阿拉伯社會的控制結構所導致。所以，「這種集權國家和虛弱的公民社會是個持續至今的歷史制度」(引用Chaney的話)。這種說法也大有問題。首先，歷史並不支持這個論點。歷史上發展的國家從來就不是什麼強健公民社會的結果。對比之下，我們看到的是像南韓和巴西這種在威權統治下被迫經歷工業化的國家，犧牲了多數的勞工所換來的經濟

成長的美名。再者，中國呢？高度經濟發展的中國是什麼強健公民社會的典型嗎？

第二，極權主義並不會阻礙現代性和發展。我們可以看看在阿拉伯國家的知識和教育狀況。美國的大學制度或是課程設計都可以在這些國家中看得到，美語也是霸權的語言與評價系統。所有的這些都在非民主的國家中出現了。而且伊斯蘭和這些事情也相安無事啊。

伊斯蘭很明顯的是穆斯林和阿拉伯世界的代稱。可是很不幸的，伊斯蘭只被當成是一種意識形態。所以我們很難用一種沒有偏見的方式去觀察穆斯林社會。在方法論上，阿拉伯不過就是全球社會的一部分，所以國家並不是發展的主要邊界，因為有全球的貿易，類似的制度等等。在全球體系下，任何的發展都是有限度的，所以伊斯蘭的政治和經濟可以被用來解釋其發展的限制。另外一方面，阿拉伯的革命也意味著民主的渴望並沒有宗教上的差異。相反地，核心的政治、經濟、民主的需要卻是要有社會正義的體制才得以可能。這就是為什麼在後革命期間的「伊斯蘭化」是矛盾地以社會正義和經濟改革之名而非伊斯蘭法之名行之了。阿拉伯革命解放了人民的政治意志，也帶來了新的挑戰。作為一位社會科學家，我們必須擦亮我們分析的武器，因為過時的東方主義早已不再適合了。■

> 當代俄國的 性別議題

by Anna Temkina, European University at St. Petersburg, 俄羅斯



女性主義團體Pussy Riot的反政府表演。

過去20多年來，研究者和運動者已經討論過在俄國的脈絡下是否適合繼續使用「性別」這個字了。一般認為他們多少有點被這個概念所困住了，所以一直在尋找某種性別運動出路的可能。當俄羅斯女性已經不再遭受歧視，墮胎已經合法化，也能經濟自主了，而且政治中也越來越多女性代表的時候，性別這個概念就似乎有所

>>

侷限了。當然，這一切都並非完美，仍有許多問題，不過對於多數人來多，性別已經不再是最主要的政治議題。

不過這狀況在過去一年來有了變化，性別又重新被賦予了新的面貌。我們因此很感興趣到底發什麼什麼事，以及想知道為什麼。可是這個轉變目前還沒有受到大眾的注目就是了。

>性別平等的道德威脅

首先，我想談談「性別」這個概念。許多學者其實也沒有注意到性別一開始是悄悄地進入了政治領域的論述之中的，而且並不是進入最相關性別平等立法裡面。性別起初進到一個不太相干也不太受到注意的地方：宗教論述。很重要的一點是，這個概念一開始有很強烈的負面意義。它代表著他者和西方，象徵著威脅和挑戰。

事件的濫觴是在Duma在討論性別平等法的時候。這個法後來通過了，不過只有少數的關注眼神和不太大的影響力。然而對於宗教圈來說這可是個威脅。宗教圈並非反對平等，不過對於性別來說就不行了。所以即使法律通過而且只會讓人有自發性的約束力時，他們還是認為性別是個危險的東西。

那到底什麼是性別的威脅呢？在概念和實際上到底代表什麼意義？而在21世紀的俄羅斯，為什麼、以及是誰認為性別平等很危險？諷刺的是，性別平等之所以變成政治議題，並不是因為性別還不夠平等(雖然這說法並不正確)，也不是因為我們仍要奮力爭取，而是因為性別威脅論已經燃燒到了政治場域中了。

>墮胎的象徵政治

在2011年底有一場健康法律的修正案討論，或許沒有太多人注意。該場討論的重點擺在要限制墮胎。這讓許多女性主義者在網路上抗議，甚至走上街頭。修正案中的許多條文後來都被放棄了，因

為大家認為不夠明確。我們可以看到女性主義運動組織的強大政治影響力。修正案的討論進行的非常困難，因為有許多情緒性發言和道德指控，而且名詞用語相當不一致。人口學家、社會學家以及其他學者都認為要減少人工流產的數量最好是透過避孕，而不是禁止。總之這也不是什麼新聞就是了。

墮胎議題是性別運動議程的核心議題。這裡面有一些衝突，一個是女性身體控制權和胚胎的道德權，另外一個是國家和個人對身體的控制與責任問題。這些問題越來越有象徵影響力，也許多實質後果產生。該法律考慮了墮胎的經濟和社會面向，從不同階級去看不同的結果。最底層階級所受到法律的影響最大，最上層階級最小，因為他們比較常避孕。避孕的爭議總之是性別運動的核心議題。在2012年9月，Petersburg國會就討論了將胚胎權利入憲的可能。

>同性戀等於戀童

法律禁止18歲以下的人公開進行同性戀和戀童行為。根據這個法律，同性戀似乎等於戀童。同性戀其中的一個驕傲認同是在公開場合展演同性戀。在某些地區，包括St.Petersburg，這個法律被認為沒有什麼道理，也導致了許多網路上的辯論和抗議。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是它所具有的象徵意義。或許這項法律從來沒有被直接執行過，不過在實際上卻影響很大，因為這同時把同性戀和戀童貼上傷害兒童的標籤。而且也起訴了許多所謂「不可靠」的同性戀或是LGBT團體。同時這項法律把其他和戀童與暴力有關的複雜議題與實務經驗給弄得更混亂了。因為這個法律的支持者其時都是局外人，而且常常沒有什麼科學根據。我們搞不懂為什麼要通過這個法案，而且也沒什麼政治和動員的效益在裡面。

>從非理性的法律到國家控制

>>

從透過這個法律去推行性別運動議程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熟悉的圖像。我們可以記得在早先State Duma Commission on Childhood, Maternity and Family所認為婚姻中的性、生育、平等的是性別威脅的言論。不過，我們要問為什麼？對誰來說是如此？到底是要減少墮胎還是要譴責墮胎？這是幫助家庭還是在要求女性返回家庭進而控制之？這是要消滅戀童者嗎？我們要把世界的複雜度考慮進來，把簡單答案的不可行和沒效率也考慮進來嗎？有試著把專家和公眾的論述納進來嗎？或者只是才重新塑造一個象徵性的武器？不考慮提供女性更多的資源？總之，這種種象徵性的言論只需要道德的訴求和俄羅斯的特殊性作為後盾，完全不把理性邏輯和合法性考慮進來。

當論證理由不夠充足時，力量將只是空洞的，然後只好把性別貼上威脅的污名標籤。其他那些黑暗、模糊、混亂、無止盡的概念只讓這種想法更加模糊與黑暗。權力的行使有絕對的選擇性，我們在歷史上可以清楚地看到這點。

在2012年的Pussy Riot，女性主義者和龐客搖滾的組織即席地在墨西哥有一場演出，具有濃濃政治意味，並聚集了很大的反對的力量。主題是世俗vs宗教、傳統vs後現代和女性主義，最後也表達了對Putin的不滿與反對。該團體質疑誰有權懲罰，限度在哪，以及誰可以使用武力？

一個平行的矛盾同時也可以在宗教論述中發現。的確，它們在上述法律的討論中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不過大眾卻大多不知道。Pussy Riot的事件讓公眾更加清楚看到國家暴力，另一方面也激起了政府的猛烈回應與追殺。團體成員被控告製造噪音、危害社會秩序，處以2年有期徒刑。國家暴力就是會在社

會批判聲音出現的時候露出真面目。最重要的是這個政教分離界線模糊的國家中，我們看到包括健康、生育、性別、性等得政策如何被宗教思想所影響。

>追求純粹的性別政治

在俄羅斯很多的研究指出現今的社會政策給予母親的支持其實相當少(包括人口政策、生育支持等)。而且對於年輕女性及其家庭的協助可說付諸闕如。女性批評政府的言論通常是不合適的生育組織、孩童健康、教育等。所以許多女性，除了那些有失業補助或是不想生小孩的人，多數要取得政府的制度性支持都必須面對很大的困境。雖然她們從不放棄努力，不過得到的回報可說少之又少。她們也知道這個困境，但是問題在於是否是以性別不平等的角度來看，或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她們才問題化本身所處在的親屬與父權權力網路。

到目前為止，當代公眾的不滿還沒有和性別化的社會政策與問題連結在一起。不過很清楚地我們看到潛在的解決方式是去追求一個更好的社會和家庭政策，以及更有效的政策制定討論過程。年輕的都市女性大多不信任國家、也不想依賴國家，卻還是得依賴社會政策的支持才可以平衡工作和家庭。

只要不平等的政策持續，只在特定地區選擇性得實施社會政策(從不同人口家庭地區中)、道德化實際需求(例如墮胎和同性戀)、使用國家暴力(Pussy Riot事件)等的案例還是會層出不窮。反性別的政治雖然進行緩慢，不過一直在結構化許多現象，像是生育率下降、高墮胎率、家庭不穩定、同性戀、少數族群權力等都被貼上性別化的污名標籤，仍然會一直被認為是西方以及崇洋者一起帶進來的危害。■

> 烏克蘭的公共社會學

by Lidia Kuzemska, University of Lviv, 烏克蘭



資深的烏克蘭社會學家National Kyiv Mohyla-Academy討論公共社會學。從左至右分別是：Oksamytna, Valeriy Khmelko, Volodomyr Paniotto (站姿), Andrii Gorbachyk,

2012年5月28日在Kyiv-Mohyla Academy和Kyiv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aras Shevchenko舉辦了一場討論公共社會學困境的研討會。我去參加之後，感觸良多。ISA的會長Michael Burawoy是主題演講者，簡短地介紹了他著名的四種社會學類型，並強調公共社會學是社會學的命脈所在。Burawoy認為公共社會學可以讓社會學家和社會學一起對社會負責。最後，他也強調了把議題帶到公共領域可以賦予社會學更大的正當性。總之，公共社會學一方面預設了有社會學家願意分享知識，另外一方面也認為為了公眾已經準備好去接受社會學的知識了。

接下來其他的討論場次則由重要的烏克蘭社會學家以及一位俄國學者Elena Trubina一起進行討論。他們辯論的主題是：在烏克蘭實踐公共社會學的意義是什麼？也討論了實踐過程中會遇到的相同困難。關於困難點，所有的學者都認為烏克蘭社會學缺乏課責性和正當性。社會學界被政策社會學所主導，因為唯有這樣才可以拿到研究資金，可是也扼

殺了對公眾的責任。而公共社會學一般來說被認為是社會學知識的簡化版本。此外，不好的公共溝通技巧和困難的語言讓學者和公眾之間的對話很簡短，像是記者喜歡的簡短提問和回答一樣，而無法激起相互理解的需要。所以大眾對於烏克蘭社會一無所知，也興趣缺缺。而學界也沒有正當性和信心去得到公眾的道德與經濟支持。

沒辦法，我很難不去同意這個悲觀的事實，不過看到有學者很努力實踐公共社會學的精神時，我又重新燃起了希望。像是Evgeni Golovakha和Iryna Bekeshkina常常在電視和報導中出現。還有從Kyiv-Mohyla Academy來的年輕學者一起創辦了Spil'ne (“The Commons”)，他們非常積極巡迴各地與公眾進行交流對話。他們其實就印證了烏克蘭公共社會學的存在。不過這只是一小群人的開端，若可以有更廣的能見度，特別是從年輕學者那邊而來的話，那麼會更棒。開放性、能見度、有用性是烏克蘭社會學可以持續發展茁壯的重要因素。否則的話，社會學將被侷限困在有限的金錢與人力之中動彈不得。

還有，公共社會學可以是公民社會的強力支柱。我們可以(也應該)轉變這個國家的樣子，一起和公眾協力、討論問題，就像學者想要把日常生活運作的隱藏肌理掀開一樣，努力去開創契機。這就是Yuri Yakovenko的絕佳隱喻。讓我們用新的科技、創新的想法、年輕的活力去開創烏克蘭公共社會學得前景。我希望這場會議已經把我們帶往正確的道路上！■

> 羅馬尼亞， 怒火燃燒的冬天

by Catalin Augustin Stoica and Vintila Mihailescu, National School for Political and Administrative Sciences (SNSPA), Bucharest, 羅馬尼亞



2012年1月位於Bucharest下城的University Square。Vlad Petri攝影。

議Raed Arafat的辭職，因為這位巴勒斯坦出生的羅馬尼亞醫生建立了Mobile Emergency Service for Resuscitation and Extrication (SMURD)。這是一個歐盟層級最好的一個組織範例。Arafat博士的去職是因為與在電視上和總統爭論。總統支持新的健保政策，讓國家許多急診醫療組織私有化。抗議團體結盟了前執政黨和其他的反對團體，而令人驚訝的是這些人許多都相信「the polenta does not explode」，意思是革命可以期待了，不過現在時機未到。經濟學人(“Rioting in Romania: the battle of Bucharest”, January 16, 2012)指出，這是意味著大眾對於這種常見的政府官員辭職動作的反應。

Arafat的辭職固然是一個重要的契機，不過運動團體把焦點放在更廣泛的議題上：中間偏右政府的擲節政策，以及政府對人民不滿與痛苦的冷漠態度。許多地方和國外的學

羅馬尼亞的政治人物似乎並不怎麼在意全球金融危機，因為當時他們正忙著2008年的普選和2009年的總統大選。然而從2010開始，羅馬尼亞的經濟開始崩塌了。為了搶救這個災難，羅馬尼亞政府以及總統Basescu跟歐盟和IMF求援，後來用了很嚴苛的條件借到了錢。同時羅馬尼亞政府也進行一系列的擲節政策，將公部門的薪資砍掉25%，然後對福利金課稅，減少社會福利，增稅了19%-24%，上千公務人員被解僱。總之，這場經濟危機和擲節措施也讓私部門重創，讓外國投

資者怯步。

在這段期間，許多老問題重新又浮上檯面。儘管我們有法律可以防止貪污，不過貪污仍層出不窮，人民越來越不滿。媒體和NGO的報導揭露了很多政商之間的不法勾當。此外，私人企業重新批評政府的貪婪和尋租的政策模式。

在2010年和2011年，公會和公民團體一起抗議政府中間偏右的政策，不過這個運動並沒有辦法動員到大眾，等到了2012年，才獲得了廣大民眾的迴響。2012年1月，上千人在Bucharest等其他50多個城市佔領街道並抗



者都 把這場運動視為是 indignados 的羅馬尼亞版。有幾個原因。第一，羅馬尼亞內部的反對聲浪相當多元，從津貼到健保，從女權到照顧，從薪資到環境等議題。第二，羅馬尼亞的抗議運動受到各方群眾的支持，從退休人員，大學生，失業者，跨國公司勞工，大學教授，女性主義者、極右翼，民粹，左翼，時尚名人，到無殼蝸牛。第三，這場動員的方式主要是網路、手機、以及電視。第四，某些主題和全球化有關(像是環境議題、女權、IMF 的政策以及不負責)。第五，有些主題是直接從 indignados 和 Occupy Wall Street 抗議中介用過來的，抗議者很團結表達批判的聲音，並且拒絕政府摸頭。

中間偏右政府試圖想要忽略這些問題的重要

性，所以把這些抗議者稱為無能的暴民、寄生蟲、瘋子。1月底，總理 Emil Boc 下台，新的健保取消了，Arafat 被任命為健康部的部長，然後政府保證會調薪。新政府不過支撐了幾個月，被反對運動逼迫讓步。雖然羅馬尼亞的運動者不過是西班牙的一小部份，但是他們的力量不容小覷。有些學者指出 2012 年 1 月是羅馬尼亞新公民社會的誕生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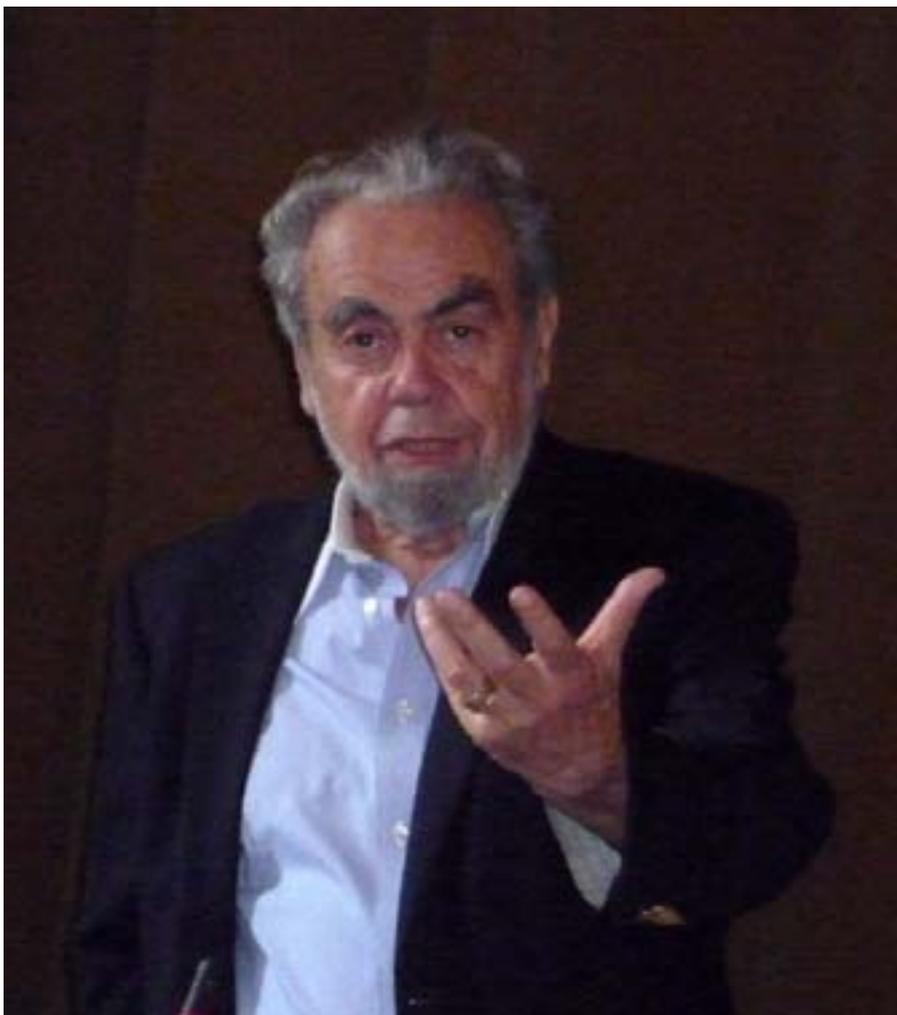
我和其他的羅馬尼亞學者(社會學、人類學、媒體研究)一同編輯了一本關於 2012 年 1 月抗議運動的書：- The Winter of Our Discontent: The Romanian Protests of January-February 2012。有些人認為現在作深度分析似乎嫌太早了。但是我們認為這永遠不會太早，特別是用公共社會學得角度去看這件社會運動。我們這本書

想要用社會學對於這場運動的分析可以和那些親身經歷過的人一起分享經驗。這裡的目的不是去得出什麼普世性的答案，但是從 Burawoy 的公共社會學角度而言，社會學究式要提供不一樣的觀點與意見。有興趣的讀者請到這個英文網站：<http://www.proteste2012.ro/en.html>。



> 超越全球化的 羅馬尼亞社會學

by Ioana Florea, University of Bucharest, Romania, and Delia Badoi, University of Bucharest, Romania, and EHESS Paris, 法國



Michael Cernea是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美國)的教授，他回到羅馬尼亞領取終身成就獎。

所關注的重點還包括了：社會學知識的用處，如何從社會學觀點制定更好的政策？

這場名為「超越全球化？」的會議進行了為期3天的辯論，這跟當初規劃的相同，也和其他學科的大會類似。第一場辯論中的一個重點是會議名稱中的那個「問號」。問題包括了：為什麼有個問號？問號意味著什麼？我們的社會超越了全球化嗎？什麼東西超越了全球化？這些問題經過辯論之後，仍然是開放性的問題。

全體出席的場次也激起了另一場辯論。Michael Burawo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Lazăr Vlăsceanu, 和Marian Preda (University of Bucharest)一同討論何謂公共社會學。為什麼要公共社會學？誰最需要？和其他社會學得關係為何？它可

對於學術界來說，6月是個重要的一個月，因為許許多多的考試、計畫申請截止日、暑期課程、學期會議等的日期都卡在這一個月。所以對於Bucharest來說，今年6月也有個很好的開始：羅馬尼亞社會學會(RSS)舉辦了國際會議。這場會議在The University of Bucharest的社會與社工

系舉行。RSS在2008年成立，將全國各地的社會學家、學術單位聚在一起，成立了超過30個工作坊。自成立以來，有越來越多的辯論聚焦在羅馬尼亞的公共議題，特別是在Cluj-Napoca所舉辦的年會場次裡面、以及最近一次在Bucharest的會議中。今年年會的主題會是社會學對於社會生活的功用。其他

以作什麼？又要怎麼作？Burawoy和其他人對於羅馬尼亞社會學得挑戰是：這裡的社會學家真的可以跟公眾溝通嗎？若是，那又對社會學帶來什麼影響？Lazăr Vlăsceanu的爭議性發言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他是RSS的科學委員會會長。他說，羅馬尼亞社會學並沒有辦法和公共領域溝通，也無法把社會學知識和大眾的生活連結在一起。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批判和反身性的觀點如何解決羅馬尼亞的需要。在這脈絡下，Burawoy的公共社會學激發了許多對於羅馬尼亞專業社會學真實面貌的討論，當然也對其公共角色的付諸闕如有許多批判的聲音出現。羅馬尼亞的公共社會學一方面是很邊緣的，另一方面也相當需要。當我們在討論公共社會學的內容和好處時，這個國家的社會學所遺留下的東西就變得相當重要。因此，社會學家Michael Cernea在這次討論中就提醒我們，羅馬尼亞其實有自己的公共社會學傳統，那就是「sociologia militans」。此一概念由羅馬尼亞社會學派的Dimitrie Gusti於1921年所提出。

過去有許多羅馬尼亞的社會學家在羅馬尼亞的社會學理論史中尋找公共社會學的身影。某個程度上，我們面對的是社會理論和社會實踐之間的緊張關係(以C. Wright Mills的話來說)。或許我們首先需要去發展一個理論和經驗研究更緊密的關係，如此一來我們的專業才會更鞏固，然後以此基礎去介入公共領域。若我們沒有公共社會學，那會是因為羅馬尼亞沒有介入公共領域社會學家，因此也無法深化在科學層次的辯論。如同Burawoy所說的：「社會學家只有在選舉的時候才出現，但是選後就都不見蹤影」。這可不是我們羅馬尼亞社會學所要的！

公共社會學的挑戰是一個重要的議題，我想不僅在羅馬尼亞如此，在世界其他國家也是。若是專業社會學迴避這個問題，將會變得很危險。因為在專業與公共之間總是存在著緊張關係，也使得社會學家在進入公共領域時會有所卻步。我們不只要發聲，還要改變社會。我想羅馬尼亞的社會學都對這個問題很熟悉：社會學可以是一種社會運動嗎？從Alain Touraine的「社會學

介入」的概念中我們瞭解到社會學沒有辦法改變社會，只能幫助我們更瞭解社會的運作方式。理想的公共社會學應該是奠基在專業社會學之上，然後把社會學議題轉譯給公共領域，讓大家更能熟悉這些議題。

Jean-Claude Kaufmann (René Descartes University, Paris V)教授則激起了我們對於規範形成的激烈辯論。這個辯論連結了巨觀的全球化 and 微觀的生活世界。Michael Cernea教授回顧了自己在羅馬尼亞社會學的經驗，以及一個很重要的他在世界銀行所進行的計畫，這些也讓大家開始討論新vs舊、在地vs全球的議題。Marian Preda教授則討論了全球化之外所可能有的社會風險與不平等。這是一個從過去一直會延伸到未來的辯論議題，因為它影響了整個世代、人口的變遷，以及消費社會的影響。

這些林林總總的問題讓這場會議生動活潑，與談者踴躍提問，講者也積極辯論。從這裡不難想像整個會議的辯論是一波接著一波，不曾停歇！而且每個場次都有Q&A，也掀起另一波辯論高潮！■

> CriticAtac

羅馬尼亞的反資本主義宣言

by Victoria Stoiciu, Ciprian Siulea, Mihai Iovanel, Ovidiu Tichindeleanu, Costi Rogozanu, Florin Poenaru, and Vasile Ernu, 共同代表 CriticAtac



CriticAtac成員: Victoria Stoiciu, Vasile Ernu, Ciprian Siulea向Michael Burawoy自我介紹。

全球對話的主編到羅馬尼亞時拜訪了CriticAtac這個團體。他們和University of Bucharest社會系一起合作，主辦了「共產主義後的馬克思主義」論壇，與會者眾。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開端，特別是在馬克思主義被和蘇聯共產主義劃上等號的這個年代裡。

CriticAtac i是社會、知識分子、政治的組織，於2010年9月創立於Bucharest。我們是左翼團體，不過我們不是任何其他左翼的分支。我們一個重要的目的是在這個頹圯、乏味、威權的公共領域中開創出新的思想。這也是我

>>

們這個群體多元的原因。CriticAtac不是一個學術群體。不過我們有一些學術圈的連帶。我們也有一個網路平台：www.criticatac.ro。除此之外，我們也組織會議、集會、辯論等。在2011年11月我們舉辦了羅馬尼亞社會論壇，聚集了社運分子和其他重要團體一起討論我們社會的公共財、抗議形式、民主化等議題。我們也努力讓公眾可以參與政治與社會議題，吸引更多的人。因為我們發現公共領域正在消失，多數人們噤聲且消失，讓政治改革工作被少數特定的人壟斷。現今羅馬尼亞的主流知識分子熱烈的擁抱市場，並且很清楚怎麼去譁眾取寵，然後讓文化市場變得更媚俗。我們有知

識分子的自由市場，還有嚴重的意識形態錯誤：反共、西化、擁抱資本主義、精英主義，這些把後共產的社會搞得很墮落，前途堪慮。諷刺的是，偏偏這些人總是說要帶領我們前進。

我們已再三強調，最重要的議題莫過於不平等、個人權利、社會權利、歧視、特權、機會平等、雇傭關係、國家與社會關係、政治的未來等等。再者，我們一直以相關的和可及的方式在討論這些議題。不過我們不熱衷於反企業的可笑行動，或是什麼幼稚的環境主義，甚至那些沒有什麼理論基礎的反消費主義。

我們不想和政黨政治分一杯羹。現今的政治已經無藥可救了，任何可行的政治只可能在政治以外的領域發生。我們認為在外才有機會，不過也不認為公民社裡面會有什麼契機，因為公民社會老是和政黨政治掛勾、充滿了機會主義者。這些都忽略了公民和社會必須脫勾的重要性。我們不一樣，我們可是要引進新的政治方程式。代議政治必須是代表全民而不是某部份的特定精英、政黨、官僚群體。在提出任何公共改革方案前，我們要重新建立我們現今觀看社會議題的方式。■

> Sociopedia.isa 三週年

by Bert Klandermans, VU-University, Amsterdam, 荷蘭, ISA財務副會長, 2002-2006

多年前ISA的執行委員會討論了出版文獻回顧文章期刊的可能性，當時的想法是在線上出版而非實體書籍，理由事實體印刷會耗費很多時間，可能讓文章過時。線上期刊的好處之一是可以即時刊出，也沒有投稿截止的限制。Michel Wieviorka、Bert Klandermans、和Izabela Barlinska一起討論了這個議題，後來也成為Wieviorka會長的主要計畫。Kenji Kosaka之後加入成為創始成員，Sociopedia於焉誕生。

Sociopedia.isa是全名，為了表示這是ISA的刊物。這也是知識傳播和出版的一項創舉。這個名稱具有兩個意義：快速的線上出版以及同儕審稿的品質保證。有經驗的編輯和審稿人維持了這份刊物的高水準，網路則讓這種回顧文章走在科技的尖端。Sociopedia.isa可以說是提供了一種實境社會科學的概念，因為它讓使用者可以閱讀最新的文章，且非常規律刊出。每隔兩年，每個條目都會要求作者再次更新，所以每項條目都會有討論。

三年前的最一開始，是由5篇文章打頭陣。至今已經有35篇文章刊出，主題涵蓋了抗爭、社會衝突、性別角色、災難研究、健康與疾病、離散、記憶、社會流動、日常生活、移民、跨國主義、世俗化、反身性等。ISA會員可以透過帳號密碼登入ISA網站或是Sage網站閱讀。每個3到4

個月，5個ISA文章都可以使用。總之，這個Sociopedia.isa已經有上千人次瀏覽過了。

Sociopedia.isa的投稿可以寄到sociopedia.isa.fsw@vu.nl。有興趣的人可以到ISA網站看看我們的投稿流程。一般說來，一篇文章是7000字，不含參考文獻。文章必須是以英文寫作，不過我們也歡同時寄來其他語言的版本，例如西班牙文或法文。不過要確定的是其他語言版本必須是與英文版相同。典型的Sociopedia.isa有如下的格式：理論回顧、經驗回顧、研究評價、未來研究方向的討論、理論化與經驗研究的可能。另外，文章也必須以下列3個部份結尾：參考文獻、進階閱讀建議、三句話左右的作者自介。

Bert Klandermans是總編。副編輯是Devorah Kalekin-Fishman, Kenji Kosaka, Elisa Reis, Arturo Rodríguez Morató, 和Henri Lustiger Thaler。規定是一篇投稿至少會送給2位審稿者。編輯會和投稿人一起討論直到文章被刊出為止。一旦文章接受刊登，就會在幾個星期內被刊出。從2013年開始，8到10個條目會被選送往Review Issue of Current Sociology刊載。這是ISA兩份紙本期刊之一。這讓Sociopedia.isa更加有吸引力。

我們還有一個創新的點子，叫做Sociopedia.isa colloquium。這是Sociopedia.isa的延伸，編輯

和審查的過程都一樣，並且會有最高的品質保證。Sociopedia.isa會要求著名的社會加從自身的知識立場出發去討論一項主題，然後由另外3到4篇文章去評價這篇文章。評價文章會要求具有批判性。Henri Lustiger Thaler會開始一個「世界主義」的討論；Devorah Kalekin則負責「感覺社會學」。

我希望大家可以踴躍投稿！來稿請寄到：sociopedia.isa.fsw@vu.nl

> 更好的全民健保

by Ellen Kuhlmann, Goethe University, Frankfurt, 德國, RC52 (專業社會學)的候任會長, Claus Wendt, University of Siegen, 德國, RC19會員(貧窮、社會福利與政策), 和Ivy Bourgeault, University of Ottawa, 加拿大, RC15 (健康社會學)副會長。

不論世界何處，更好的醫療保險是對抗社會貧窮與不平等的重要選項，也是政策制定者該追求的目標。各地的保險制度或許不同，不過共同之處都是要追求一個更好的組織、分配、和使用的醫療保險。其中包括一項很重要的是新的健康專業治理的模式。我們已經可以看見社會責任和公共部門對於健保來說相當重要，不過當前還是由私人公司從中受惠最多。所以我們要考慮現有的權力關係不對等的現實，找出更創新的方式去超越當前的侷限。

在 Buenos Aires 的 ISA 論壇中的第二場會議就是討論健康政策，從社會學和國際的角度去看這個新興的領域 (請見 Current Sociology, Special Issue, July 2012)。這個領域是跨學科的，所以要求舉辦聯合會議。這個提議受到熱烈迴響，也感謝主辦者 RC15 (健康) 和 RC19 (社

會政策) 負責舉辦了「更好的全民健保」場次，也有 RC15 和 RC52 (專業) 舉辦了聯合場次討論健康政策。這些討論會都帶進了精彩的議題辯論，相當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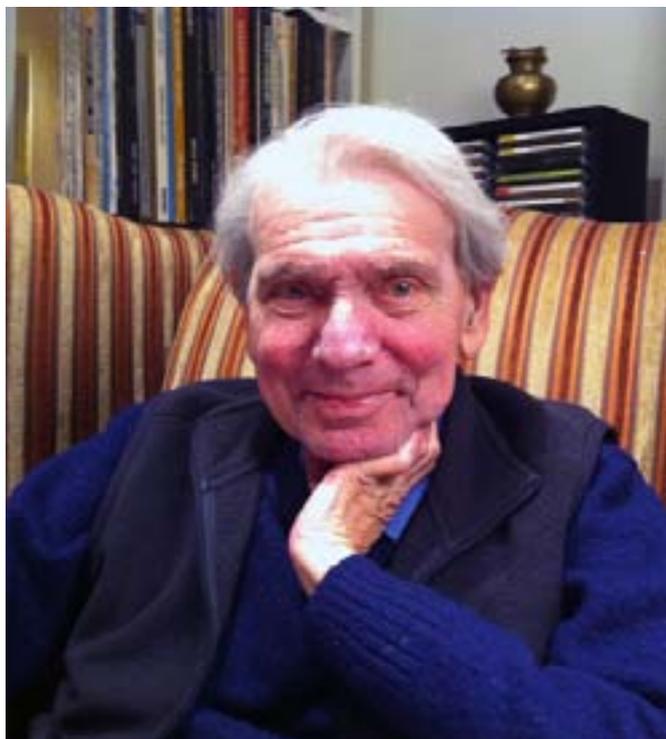
這些會議都討論了健康政策和服務中的重要議題，以及經驗分享與傳承。其中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是不同語言之間的溝通障礙因為報告者和與談者的雙語能力而克服了大半，而且各國的參與相當踴躍，從全球北方、南方，從歐洲、澳洲，從奈及利亞、南非、日本而來參與盛會。

主要的議題包括了比較健康政策研究中所面臨的挑戰。針對這點提出的建議包括了要使用複雜的類型分類，要連結巨觀和微觀的研究，以及要找出各種指標。另外一個重要的議題是不平等。健保不平等的例子可說是層出不窮，包括的性別、女性的健康權等。其他的面向也

包括呢文化、語言、地區、族群等不平等。共同的主題都是關心權利和健康保險的使用權，還有社會運動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公私部門之間的不對稱。最後還有專業治理和健康資源管理等的議題。

毫無疑問的是這些聯合會議為 RC 帶來了許多契機與價值，我們期待更多的合作空間，也希望在橫濱大會上能有更好的討論出現。■

> 悼念Ivan Varga (1931-2012)



Ivan Varga 具有有多重身份。其中一個最重要的是和ISA的淵源，特別是 RC22 (宗教社會學)，為大家所記得。下面的悼文由他的妻子Eva Varga和女兒Christina Varga所撰。

| Ivan Varga攝於家中，Kingston，加拿大

Ivan Varga勇於說真話，不畏懼強權。他出生於匈牙利Budapest的猶太家庭。在二戰期間，他不顧危險，在宵禁時間出門，冒著被逮捕和射殺的風險，只為了幫家人拿到更多的食物配給。

Varga從無情的戰火中逃過一節。不過緊接看到的卻是蘇聯解放帶來的極權夢魘。但他並沒有因此噤聲，反倒是大肆批評政府，使得他在1956年的匈牙利反抗運動中被政府鎖定為必須逮捕的異議分子。他流亡到波蘭。當後來他有機會回去家鄉時，他發現他其實早就被列為黑名單已經好幾年了。

戰後他追隨Georg Lukács從事研究，然後攻讀博士。於1961年和Eva Launsky結為連理；1968年女兒Christina出生。

Varga精通多國語言，所以也在Tanzania教過書，與家人在那定居過一陣子。在4年之後，他們前往一個不確定的

國度：匈牙利。在飛機在德國降落後，隨身只帶著衣服、非洲的藝術品、以及知識而已。

他也在德國的大學任教。一年之後到加拿大的Kingston的Queen's University執教，1996年退休，然後成為榮譽教授。

他一生都貢獻給文化、宗教、藝術社會學，也對身體社會學產生興趣。Varga在國際的研究社群上相當活躍，和許多國際學者合作，也在Harvard's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World Religions研究，而且足跡遍及法國和匈牙利。

退休後，Varga仍然繼續寫作，編輯國際期刊，參與國際學術社群。他繼續完成他與ISA共同進行的10年研究計畫，那主要是個和宗教研究委員會有關的計畫。在該委員會的會長任期結束後，他成為榮譽會長。他也帶著這份榮譽長眠。■

> 開放使用 開啟了那一扇門？

by Jennifer Platt, University of Sussex, 英國, ISA出版會長, 2010-2014

「開放使用」(Open Access)是一個快速普及世界的運動，而且當這股力量接近了社會學時，也帶來了威脅。他們的主要思想很簡單，就是每個人都可以從學術期刊的知識中受惠。這一開始是自然科學家為了表達對於那些收費昂貴期刊的憤怒，也促成了拒絕Elsevier 期刊的運動。最近的另一項訴求發生在英國，就是他們認為政府的資源應該開放給所有的公民，不能被少數人所壟斷。同時他們也認為這種開放使用也可以讓企業獲利，促進經濟成長。現在美國和英國的主要資金提供者已經開始要求接受資金的研 究只能發表在學術期刊。這迫使期刊要調整他們的政策。

現行的制度是期刊必須使用者付費。主要都是由大學購買，然後大學內的成員可以免對使用。現在變成是主要賣給圖書館，一次就賣很多份期刊，不能單獨購買。所以對圖

書館來說成本就很昂貴。重要的是作者不用負擔出版的成本，然後這個成本就變成是大學要消化吸收。毫無疑問的是這個成本相當高。

開放使用的2個選擇方案已經被廣泛討論了。其中一個是「金」方案，就是要作者負擔部份出版成本，然後開放免費使用。另一個是「綠」方案，作者不用負擔生產成本，不包括期刊只可已有回溯6到12個月的使用期間，好讓使用者有動力去付費訂閱。

這兩個方案都可以讓作者可以用更多的讀者，也讓讀者可以擁有使用權。除此之外，還會有那些影響呢？

金方案：貧窮國家的學者可能沒有辦法在富裕國家的期刊上出版文章，除非他們有國際的資金資助。不過在社會學並非如此。不過我們也不清楚沒有大量資金作後盾的研究者是否可以不用付費。富

裕國家中較為沒錢的大學也會有自己的出版規定。而大學或許可以省下訂閱成本，不過也未必會把這個省下的錢用在研究上面。

綠方案：使用者不用付費，除非那有足夠的圖書館和讀者願意負擔回溯使用的費用。所以出版商比較喜歡金方案。有經驗的社群像是ISA可能會因此失去某些收入，而這些收入可以用來支援其他活動。

當然因為篇幅關係，還有很多細節的差異我們在此無法呈現。像是有些人認為我們可以有混合模式，讓一些期刊可以免費開放，一些則否。這正是美國社會學會的作法。有些期刊則會傾向刊登那些資金來源不要求開放使用的文章。英國國家研究委員會要求所有的期刊都要開放使用，而且連資料也要開放。這將會對社會學知識產生什麼影響呢？

ISA很顯然是需要針對

>>

這個國際趨勢想出對策的，若是可以知道這對全球社會學社群所帶來的影響，那麼將是美事一樁。我們都知道很多地方的期刊出版都跟歐美看齊，也很多人在思考這是否值得效法。請來信告訴我們您的想法，這將會對我們這個社群有很大的貢獻！來

信請寄給 j.platt@asussex.ac.uk。■

> 介紹印度團隊

by Ishwar Modi, 印度社會學會長, ISA 執委, 2010-2014

當我在閱讀上一期的全球對話時，發現其他的編輯團隊幾乎都是大學生或研究生，這讓我驚訝不已。相較之下，我們印度團隊較為年長，經驗較為豐富。我們的主要任務是提供一份標準的Hindi語翻譯版本。這項工作普遍被認為是很艱難的。而我也很訝異我其他的同事說：Hindi語的全球對話被用來當作翻譯的教材，同時也讓學生進行翻譯，然後比對，好讓他們知道如何增進翻譯品質。所以我很高興也很榮幸在此可以跟各位介紹我們的團隊。



Ishwar Modi 教授是印度休閒研究的創始者。同時他也是印度社會學會長、社會科學國際研究院長、ISA執委。他也連任了ISA 休閒研究委員會的會長(2010-2014)。2000年時，他從Jaipur的University of Rajasthan 休閒旅遊系創系主任一職退休，然後到健康管理研究院擔任訪問教授。他是世界休閒組織的榮譽會長，也是世界休閒學院的會員。他主辦過許許多多國內外大大小小的學術會議，並著作、編輯了8本書。



Rajiv Gupta 是Jaipur的University of Rajasthan 社會系的系主任，也是一位熱情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家。印度社會科學會在2007年頒給了他 D.P. Mukerji Senior Social Scientist Fellowship。最近的研究是關於教科書的社會學研究。在Communalization of Education or Education of Communalization一書中，他發起了一項全國性的辯論，並讓右翼政黨蒙羞不已。Gupta是一位印度社會的專業觀察家，關注農業、暴力、工會運動、城市發展、教育、專業社群。他的博士論文研究當代印度社會的學院知識分子角色。作為一位公共社會學家，Gupta也參與各種社會運動，包括反對新字由主義的抗爭。



Rashmi Jain在University of Rajasthan的社會系任教，興趣在於發展、溝通、全球化、法律、歐洲、休閒。同時也在做田野，攻讀社會工作的碩士學位。現在正在進行一項名為「全球化下Rajasthan的社會與文化」研究。她出版過的著作名為Communicating Rural development - Strategies and Alternatives。在學院之外，她也從事婦女運動 Rajasthan的公民社會運動。



Uday Singh在過去6年內在印度社會科學會工作，從事的研究計畫為Ishwar Modi所領導。他有University of Rajasthan財務經濟管理的碩士學位。在翻譯全球對話的過程中，他相當高興可以見到那麼多世界上其他地方有趣的現象。

> 在邊緣求生存

Alexia Webster, 攝影家, Edward Webster, University of Witwatersrand, 南非, ISA前RC44委員會會長



在南非Johannesburg有許多很不穩定的工作。這些工作是非正式經濟的一部分。他們包括了在道路上的美髮師、小販，在路邊清潔計程車的人，或是在家無照營業的旅館，以及那些拾荒的人。

我們的照片紀錄下了其中一位拾荒者的身影。她是黑人女性、老人，正在前往資源回收中心的路上。她的樣子有點像幽靈鬼魅一般，因為在她背負裝著資源回收物品的大袋子下，我們簡直無法辨識她的模樣。但是只要定眼一看，就不難發現，她的身軀被那個大的回收袋子壓得幾乎變形了。但

她是無助的可憐老人嗎？不，她可是勤奮工作的勞工哪！每天上工10小時，收集廢紙，然後徒步運到回收中心，為的就是賺取那微薄的生活費。這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工作」，而是為了餬口飯吃、不得不做的一份差事罷了。她回收費紙，看似為不足道，但卻貢獻極大，因為她幫助清理了我們骯髒的環境，是一份「綠」工作。可是，你可以想像她一天的工資不過只有5美元嗎？

這份工作的另一個特色是她自我僱傭。他們可以在城市中成功地找到工作的空間，用非常不同於傳統的方式去從事經濟活動。而這些工作的出

現也為社會學家帶來了新的謎題。之前的現代化理論用一種目的論的方式論證說：工業化可以提供足夠的工作，吸引大量人口到城市裡面。這個美好的烏托邦圖像只發生了一半。城市的確是大幅擴張了，可是非正式部門的經濟活動也增加很多。在照片中，我們幾乎看不到她的身影，不過她確確實實地存在著，是這個急速擴張的非正式經濟體的重要一員。